



Library of Congress

“我不会烧掉我的印刷机和熔化我的活字”

David Talbot

美国人历来深情赞赏和推崇新闻自由，但是，自由的媒体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和它在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是美国一开始就面临的难题。本文回顾了早在18世纪初一名报人应对挑战的经历。这位早期捍卫反映一个多元社会不同观点的自由和无偏见新闻的先锋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

本 杰明·富兰克林¹
(Benjamin Franklin)
开创了美国的新闻自由，然而他是他所钟爱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 (Benjamin Franklin Bache) 的奋斗和献身才给了它生命。这两位卓越的早期美国人的故事提出了当今依然中肯的问题：如何保持有活力的新闻

戴维·塔尔博特是《沙龙》(Salon) 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

自由？媒体的导向应该是不偏不倚的还是有党性倾向的？如果新闻工作者认为总统班子威胁着国家的价值观和福祉时，他们应该积极地冒险对抗它吗？虽然富兰克林和他的孙儿都是狂热的民主主义者和对精英治理的批评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都予以接受。今天的美国媒体在搞清这些问题时，也同样有分歧的看法。

本·富兰克林23岁时，于1729年在费城 (Philadelphia) 开始发行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 在很多方面当属首家现代美国报纸。它将新闻、舆论和道听途说、性建议和耸人听闻的犯罪报道结合在一起。富兰克林——一个不能忍受清教徒式的情感压抑的思想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者——醉心于发行

¹ 本杰明·富兰克林 (1706 - 1790)，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 和制宪会议 (1787)，发明避雷针等。 编注

上图：美国早期的报刊出版人干的是令人筋疲力尽、肮脏和令人厌恶的活，因为当时被称为“排版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将编辑责任和操纵手动印刷机结合一起。这种活确实令人厌恶，因为用以活字上墨的羊皮球浸泡在尿中后得用手绞拧。

本文首次出现在Salon.com的 <http://www.Salon.com> 网站上。其网上版本留在Salon档案中。经同意重新刊登。

一张不仅能反映他的进步政治观点还有他那世俗的，有时是近乎淫秽意识的大众性报纸。

但作为一个报纸发行人，富兰克林绝不是个征战者。早期的美国报刊经济基础脆弱，依赖的是少量读者和势单力薄的商界。“排版工”——当时发行人有此称谓，因为他们大多数将编辑责任和操纵手动印刷机的令人筋疲力尽、肮脏和实在令人厌恶的活来给活字上墨的羊皮球浸泡在尿中后用手拧干结合一起——得罪不起太多读者和刊登广告者。因而，相信稳妥商业实践的富兰克林依靠他狡黠的才智并躲在虚构的署名后面阐述他的主张。

用富兰克林的话说，他依然经常“受到不同人士不友善的批评和谴责，因为他刊登了他们说不该见报的内容。”1731年5月27日，为了回应批评者，这位年轻的报人发表了著名的《公报》社论《为排版工辩白》(Apology for Printers)的文章，对此沃尔特·艾萨克逊(Walter Isaacson)在他所著的出色的富兰克林传记中写道：这篇社论“始终是对新闻自由最好和最有力的捍卫。”富兰克林在他笔触冷峻和尖刻的文章中为之叫好的新闻界不是个狂热的派性新闻界，而是一个向各种对立观点敞开大门的新闻界，这些观点可能反映也可能没有反映发行人

的观点。富兰克林指出，出版是一种行业，就像制鞋业或木工作业，但是做的不是靴子或板凳，而是印刷“人们的意見”，它们“几乎和人们的面孔一样各不相同。”再者，“如果所有印刷者都得等到他们确定不会冒犯任何人时再决定印什么的话，那就没什么东西可印了。”

富兰克林以他典型的幽默方式，用一个骑驴的人和他儿子去市场的寓言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个人骑着驴子，他儿子不得不走路，因而遭到一名过路人的批评，那人让他儿子和他一起骑驴，结果另一个过路人又指责他使那可怜的牲口负担过重。他立即下驴，可是下一个过路人尖锐地责骂他儿子说他是个“不知好歹、无赖似的小混蛋”，竟让他“上了岁数的老爸……在那儿蹒跚而行。”当儿子

下来和父亲一起走路时，却又被另一名过路人讥讽为“一对无知的笨蛋”，明明可以骑驴却要在泥土路上行走。最后，那父亲再也无法忍受批评，他转向儿子并建



Library of Congress

1778年4月24日（星期五）出版的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公报》。本·富兰克林23岁时，于1729年在费城开始发行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在很多方面当属首家现代美国报纸。它将新闻、舆论和道听途说、性建议和耸人听闻的犯罪报道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容忍清教徒情欲抑制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人，富兰克林一心一意发行一张不仅反映他的进步政治观点还有他那粗俗的，有时是近乎淫秽意识的群众性报纸。



Library of Congress

FRANKLIN IN PHILADELPHIA

Franklin and Philadelphia. It was the "happy marriage" of our early history. The story of his arrival in the city as a poor boy with a loaf of bread under his arm is a true American legend. The secret of his success was his rare common sense and his ability to make

others see a plain fact, plainly arrived at. He was a printer and publisher, an inventor, a scientist, a philosopher, a public-spirited citizen, and a statesman. Before he died he was hailed as the "wise man" of the new nation.

这是一幅本杰明·富兰克林年轻时在费城的版画。画上的文字写道：富兰克林和费城。这是我们早期历史的“幸福婚姻”。腋下夹着一个面包的穷男孩来到这个城市的故事是个真正的美国传奇。他成功的秘诀是他罕见的广博见识和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使他人看清普通事实本质的能力。他是个印刷工和出版人、发明家、科学家、哲学家、有公众精神的公民和政治家。在他故世前，他被誉为新国家的“明智人”。

议“在下一座桥上把驴扔进河里，它就再也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了。”

可是富兰克林发誓说，他绝不会从桥上扔掉他的“驴”，即他的印刷机。“我将继续经营我的报纸。我不会烧掉我的印刷机和熔化我的活字。”

富兰克林写道，印刷工的责任不是避免争论，而是确保争论双方在他的出版物中都能落脚。如艾萨克逊所言，“概括了启蒙运动关于言论自由的立场”和“如

今用框架挂在新闻室墙上”的那句名言中富兰克林写道：“印刷工被灌输的信念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双方都应有被公众聆听的同等机会；而当真理和谬误公平竞赛时，前者总能胜过后者。”

富兰克林还在不那么高尚的层面上，也以仍然被各地小报发行人采用的论点，为印制一些黄色内容辩护：不要怪我们，怪读者吧，这是他们要的。“如果（印刷工）有时印制不值一读的恶意

的或愚蠢的内容，可能并不因为他们自己赞成，而是因为人们受的教育谬误有毒以至好的东西得不到鼓励。”富兰克林讥讽地说道，如果可对无聊的读物和“大卫的诗篇”² (David's Psalms) 的“一个出色版本”加以选择的话，哪个从书架子上飞下来是没什么可吃惊的。

在日后的《公报》上，

² “大卫的诗篇”是指《圣经旧约》所载主要由以色列国王大卫写的诗篇。译注

富兰克林为闲言碎语的题材提出了更具挑衅性的辩解：它打击有钱有势的人的嚣张气焰。富兰克林写道：“它常常是防止有权势、精明、居心叵测的人变得过分得势的手段。（似乎）有着100只眼睛和1000个舌头细察一切的指谪很快发现，并同样迅速地把他们每条最小的罪行或他们性格中微小的缺点向四面八方加以扩散。这就折断了他们野心的翅膀。”

正如艾萨克逊所说，事实是虽然富兰克林“在《公报》上玩笑似地为闲言碎语辩解，”实际上他并没有陷得太深，而是被“他个性中较为认真的另一半所制约——他总是决心不说任何人坏话”。

然而，这位注定要成为受人尊崇的开国元勋却并非不屑于刊登有刺激性的故事，其中包括载有《为印刷工辩护》那期后的一周发表的故事：一个男人发现他的老婆跟一个名叫“石匠”(Stonemason)的男人在床上后，持刀冲向他的竞争者，引出了富兰克林在报道中用了关于阉割的逗乐的双关语。

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和人民大众的一员，富兰克林知道发行一张成功的报纸的诀窍，即提供读者一份有吸引力的高低层次兼有的混合读物。这是当今革新发行人基本上忘之脑后的窍门。他们在古怪的信念下劳神费力地工作：认为灌输干巴巴的愤慨言论

和道德说教就能拢住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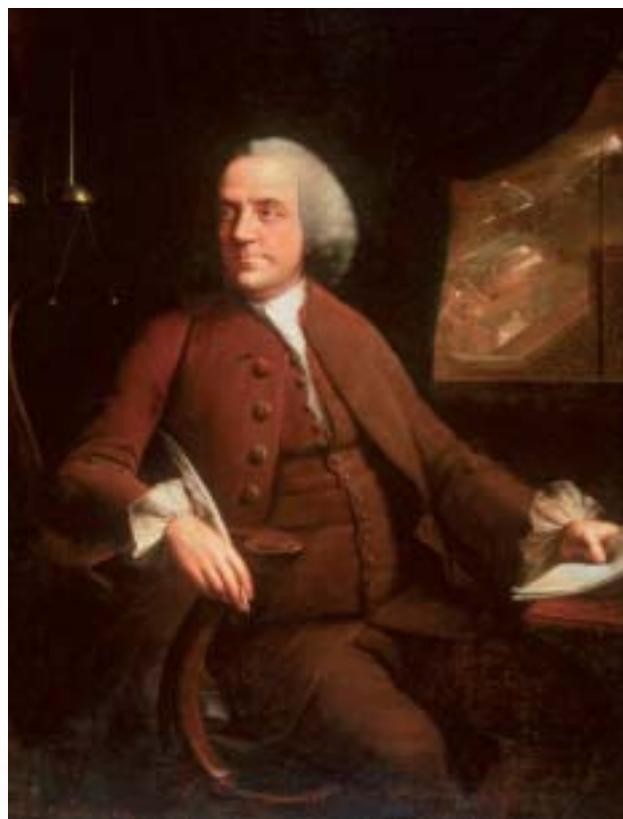
1748年，富兰克林42岁（正是他寿命的中点）时从艰苦的印刷业退休而献身于政治、科学和外交。他能挂起印刷工的围裙，与其说是他的报纸的成功，不如说是他那本特许发行的鼓励人们自助修身的《穷理查德的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带来的丰厚的盈利，它每年卖出（当时）惊人的1万册。富兰克林将办报的癖好传给了他钟爱的外孙本尼³(Benny)·贝奇。本尼最终丢弃了他外祖父关于回避派性的忠告，创办了独立前美国最有影

³ 本尼是本杰明的变体。 译注



自富兰克林的印刷机上印制的一份《美国宪法》。

右图：1762年绘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肖像油画。富兰克林写道，“印刷工被灌输的信念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双方都应有被公众聆听的同等机会；而当真理和谬误公平竞赛时，前者总是优于后者。”



AP/Wide World Photo



AP/Wide World Photo

承人，本尼·贝奇受到费城上层社会的欢迎，并被认为是最宜成为乘龙快婿的年轻人之一。他这样一位显要的绅士受到有地位朋友们的鼓励用他祖父的印刷机从事书籍出版这一受人尊敬的行业。但是，贝奇的血液里流淌着报纸的油墨。就在富兰克林去世不久，贝奇就推出了一份费城报纸。抱着商业赢利的期望，他起初将报纸定名为《大众广告报》(*General Advertiser*)，4年后改名为《曙光大众广告报》(*Aurora General Advertiser*)。最后，当他的商业成功梦想被更具神圣意义的抱负取代时，干脆就称它为《曙光报》。

“开始时，贝奇还忠实地遵循他祖父在《为印刷工辩护》中奠定的政策，在创刊的那一期中承诺他的报纸将是中立公正的，”历史学家杰弗里·L. 帕斯利 (Jeffrey L. Pasley) 的一书《印刷工的专制》(*The Tyranny of Printers*) 写道。该书非常吸引人、丰富详尽地记述了新闻自由是如何从早期美国兴起的编辑印刷工和占统治地位的联邦主义精英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为时不久，贝奇厌倦了这种特意不冒犯人的新闻报道风格，并被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总统君主主义倾向所震惊 — 他将其视为背叛了他外祖父和美国革命者同胞为之战斗的民主原则 — 他率领着他的

2004年时的一家伊拉克印刷厂。取消新闻检查后，报纸成为自由论坛。将近170家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取代了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政府掌控的5家主要报纸。

响，也最有争议的出版物 — 《曙光报》(*Aurora*)。

尽管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生命短促，但却有电影似的传奇。1776年他7岁时，随同他那著名外祖父的历史性出使法国（在这次使命中富兰克林将争取法国对美国事业的支持，以拯救革命，而后与英国协商和平条约）。他在返回费城自己家里之前在法国待了9年。他在上层人士子女就读的法国和瑞士学校受教育，并在哲

学家伏尔泰 (Voltaire) 去世前不久接受他的祝福（伏尔泰将满布皱纹的手放在男孩的头上，用英语说道，“上帝和自由”）。后来富兰克林将贝奇委托给法国印刷名匠弗朗索瓦·迪多，向其学习浇铸活字。

1790年，享年84岁病逝在费城家中的富兰克林临终前把贝奇叫到床前，握住他的手，将他的印刷设备遗赠给他21岁的外孙。作为美国纪念碑似人物宠爱的继

报纸投入了与联邦主义势力的斗争之中。

正如帕斯利所写：“贝奇的党派倾向是代价昂贵、需要大勇气的信念……这位年轻的编辑对全面投入正在冒头的党派争斗是有严重保留的。过一种与政治无关或保守的费城贵族那样的隐蔽生活会轻松得多，但是贝奇希望顶住这种诱惑。‘当（政治界线）要明确划分时，’他写道，‘我希望我站在它正确的一面。’”

由于他自己无可挑剔的革命传统，贝奇对国家的第一任总统毫不畏惧，将其视为一个军事骗子和想当国王的人。1797年华盛顿任职期满时，贝奇在《曙光报》上登载了大量猛烈抨击国家元首的报道，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天，号召为结束“政治的极不公正”和“合法化的腐败”而举国“欢庆”。

这种对美国领导人越来越多的鄙视——在华盛顿的继任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执政期间有增无减

——贝奇在费城有地位的老朋友们认为太过分了，他们激烈地攻击他，在上层社会圈里冷落他和他的夫人并抵制《曙光报》。由于登广告者离弃该报，贝奇的损失与

日俱增——在他担任发行人的8年中，《曙光报》赔了近2万美元。但是，贝奇和他的夫人即出版合伙人——圣克罗伊(St. Croix)的一名蔗糖种植园主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却锲而不舍，将他们名门望族的朋友换成了，用帕斯利的话说，“普通熟练印刷工、报纸撰稿人和街头及小酒店活动份子的政治下层社会”，并把他们



Library of Congress

身为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成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钟爱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对手。贝奇将他的报纸作为党派政治的平台，还作为反对试图在新闻界压制相对立声音的政府压力的工具。他为他激烈的战斗付出高昂的代价，失去了朋友、财产，最终还因遭到暴徒的殴打和监禁而失去了健康。

的家和在市场街(Market Street)上同一幢楼里的报纸办公室变成激进共和主义的总部。

亚当斯当选后，联邦党人对贝奇的仇视发展成迫害。1797年

春，他在费城码头区参观一艘船时，遭到一名年轻联邦党人的袭击而严重受伤。亚当斯政府却将伤害贝奇的凶手派往法国出任外交官作为奖励。翌年，贝奇在外时，一伙醉醺醺的联邦党人包围了他的家并恫吓他的妻子和孩子，后被邻居赶走。这些袭击使这位发行人琢磨是否“也许要是我被人宰了，的确会使一些人心满意足呢。”

贝奇的敌人可能并不真想杀他，但要他坐牢是肯定的。第二年，国会(Congress)中的联邦党人推出了臭名昭著的《煽动罪法》(Sedition Act)并使之通过。托马斯·杰斐逊⁴(Thomas Jefferson)评论说，这是一个直接针对他的共和主义同盟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法案。1798年6月26日，一名联邦法官逮捕了贝奇，并指控他犯有“诽谤总统和行政政府”罪。在缴纳难以承受的4000美元保释金的艰难情况下，贝奇被迫向朋友们求助，《曙光报》和他的家人挣扎在毁灭的边缘上。

贝奇饱受经济和法律困难外，又增添了侮辱：他遭受了一位名

⁴ 托马斯·杰斐逊：(1743 - 1799)，美国第3任总统(1801 - 1809) 译注

为威廉·科贝特 (William Cobbett) 的反共和主义画家连珠炮般的个人诽谤攻击。科贝特在他取名得当的报纸《豪猪公报》(*Porcupine's Gazette*) 上使贝奇毒剑穿身，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拿法国钱的”出版人，是“妓女养的印刷工儿子”，对他应严加处置就像对“土耳其人、犹太人、雅各宾⁵份子，或一只狗”那样，并要求取缔《曙光报》。

贝奇的生命处于最低谷时 —— 甚至他的父母因他的新闻征战而与他断绝关系 —— 他转向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敦促他们以订阅《曙光报》来拯救它。他们真这么做了。因《煽动罪法》而忧心忡忡的数以百计的新读者订阅了该报（以相当高的一年8美元的报费）。如帕斯利所写，贝奇更惊奇地发现许多赖帐的订阅户 —— 这在早期报业里是个普遍现象 —— 突然将欠费缴清，少数订户居然还预付了下一年的报费。四面楚歌的贝奇被这种喷涌而来的支持几乎感动得落泪。他感激地写道，“国内自由的敌人的恶言中伤没有使本编辑失去大多数同胞对他的好感。”贝奇发誓他不会辜负他的支持者，他将坚持战斗，不会被那些“让权力的强光照射得头昏眼花的小人的恶意中伤”所吓倒。

1798年9月7日星期五，就在写了上述这段话后没几天，贝奇

病倒了，成了肆虐费城的黄热病的受害者。贝奇夫妇先前的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纷纷逃往乡下，但是这位报人和他的妻子已经无力担负这种避难的需要了。帕斯利写道，“无论如何，这位编辑决心坚守岗位。”第三天，贝奇病故，年仅29岁。

《曙光报》没有随它的创办人消失。悲痛的玛格丽特·贝奇发誓要继续办下去。在新编辑威廉·杜安 (William Duane) 的帮助下，她如愿以偿。贝奇临终前指定狂热的美籍爱尔兰人杜安为继承人。后来杜安娶玛格丽特为妻。他使《曙光报》更上一层楼，达到全国知名的新水平，并利用它的势力帮助创建了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1800年，杰斐逊将其竞选总统获胜归功于《曙光报》和有同样指导思想的其他报纸，称赞它们点燃起一场“公众思想上的革命，阻止了我们的政府走向君主制的快速步伐。”

本·富兰克林很可能不会希望他那么钟爱的外孙经历如此动荡的生活。富兰克林自己一生中以幽默和谋略在政治风暴中航行，他从不将他的财富下注在新闻征战上。富兰克林擅长精心制作高度依赖消遣性素材，而不只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和道德思想的混合报刊内容，还善于经营像《穷理查德》那样的赢利性副产品业务。

但是时代变了，有时怀有公益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处于更为动荡的环境中，就如本杰明·贝奇那样。由于在革命中产生的新的统治精英们准备将自己安置在美国君主政体之中时，他决定不能再听从他外祖父的谏告而保持不偏不倚。

或许在这方面，他还是走上了他祖父的道路。如艾萨克指出的那样，因为富兰克林是开国元勋中最民主的，甚至比杰斐逊更主张平等。父亲是一个肥皂和蜡烛制作者，当印刷学徒起家的富兰克林，真正相信普通百姓的权利和美德。正是这些普通的男女、这些热爱自由的人们在本杰明和马格丽特贝奇夫妇被赶出费城的贵族圈子时，和他们交朋友。也是他们 —— 这些相信用美国人的鲜血赢得的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 —— 在贝奇和他的报纸最艰难的时刻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使《曙光报》继续光芒照人。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些是与过去勇敢决裂的人们写在羊皮纸上挑战的词语。这些只是言词而已，直到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那样英勇的新闻工作者们在政治搏斗的火焰中将它们铸成了闪亮、不折的金属。◇

⁵ 雅各宾：1789 - 1799年法国革命时期，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译注